

张謇 :与众不同的企业家

罗一民

摘 要 清末民初的动荡岁月 ,造就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张謇。他忧国忧民、救亡图存 ,是爱国主义的典范。为完成强国梦 ,他选择了“舍身饲虎”的办厂之路 ,百折不挠 ,愈挫愈勇 ,至死不渝。他亦政亦商 ,是政商互动的楷模。他兼具官员和经商者的双重角色 ,凭借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深刻理解 ,较好地处理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他从事公益 ,发展教育 ,是地方治理的精英。他只手打造“中国近代第一城” ,从文化建设、社会治理、生态改造等方面全方位推进南通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 张謇 强国梦 政商互动 中国近代第一城

中图分类号 F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63(2021)01-00042-07

谈到南通的清末状元张謇 ,大家都公认他是一位企业家。张謇身上确实有一般企业的共同属性 ,包括投资创办、经营管理企业 ,根据市场需要生产销售各类商品 ;在主观上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 ,为国家经济社会做贡献 ;以特定的经营管理专长和能力 ,自成一类社会群体——企业家。然而张謇的伟大 ,不在于他和一般企业的共同点 ,而在于他不同凡响的与众不同之处。正是独特卓越的个性所为 ,才成就了他人生的辉煌 ,创造了不朽的业绩 ,为后人由衷地景仰。也正因如此 ,习近平总书记才把他称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与一般企业家相比 ,张謇的与众不同之处在哪里 ?

一、一生痴迷强国梦

爱国之心 ,人皆有之。但是 ,像张謇那样 ,一切从爱国出发并将浓烈的爱国情化为对强国梦的执着追求 ,并坚持终身而不渝的却十分罕见。张謇自幼熟读四书五经 ,身受儒学“忠君爱国”传统思想影响 ,具有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他生长在国难深重、山河破碎的清末民初 ,要爱国就必须救国。而要想救国首先必须强国。只有使国家强盛起来 ,才能不受外强欺侮 ,救国家于沉沦中 ,自立于世界之林。由爱国而救国 ,由救国而强国 ,是那个时代包括张謇在内的爱国志士的基本心路历程和行为轨迹。张謇是其中最执着、最痴迷的一位。

(一)为强国 ,“舍身饲虎”

1894 年 ,张謇高中状元 ,授翰林院修撰。他本可以“天子第一门生”的身份 ,凭借亿万莘莘学子

收稿日期 :2020-12-18

作者简介 :罗一民 ,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

梦寐以求的最高平台,博取一生的荣华富贵,甚至走向“状元宰相”的道路。但是,考取状元的当年,甲午战争中方的惨败,及随之而来难以忍受的割地赔款重负和国家从未蒙受过的奇耻大辱(与两次鸦片战争有所不同),促使满怀浓烈的爱国心、强国梦的张謇做出了不同凡响、惊世骇俗的抉择。

1894年的下半年,张謇因父去世,回乡奔丧,丁忧三年。第二年,便在家乡南通创办纱厂,开启了他艰辛而崇高的实业报国之路。

在商人地位低下、工商业落后的国情下,以新科状元和朝廷近臣的身份,弃官经商办厂,在当时确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和想象。这并非意味着发财致富,而是要在自弃仕途和尊贵社会地位的同时,冒着巨大的风险和难言的艰辛,周旋于地方官场、商界、各色人等之中,奔波于险象环生的风口浪尖之中,承受“千磨百折,忍辱受讥”。确如张謇自己所说,是“舍身饲虎”。

张謇之所以选择“舍身饲虎”的办厂之路,完全是为了圆他的强国梦。这颇像林则徐所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在张謇看来,“策中国者,首曰救贫,救贫之方,首在塞漏”,塞漏救贫,必须兴办实业,而“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要办好实业,则须奉行“棉铁主义”,形成棉纺和钢铁业为基础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而南通棉多质好,农村种棉纺纱成风,搞棉纺实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而,张謇首先选择开办纱厂作为他兴办实业以强国家的宏伟计划起始第一步。正如他在为纱厂拟定的“厂约”中所说:在通州创办纱厂,既是为通州本地的百姓生存考虑,也是为中国的资源和利益考虑。

(二)为强国,百折不挠

张謇的创业,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艰辛的磨难,并屡经挫败,但为了实现他心中的强国梦,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忍常人所不忍,为常人所不为。刚开始筹办纱厂时,张謇本想在民间集资,搞“商办”,但通州和上海两地的商人富户,虽有资金,却不愿轻易投入。他便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改为官商合办,由官方提供搁置上海久未使用的纺纱机,作价

五十万元作为官股投资,另由张謇组织绅商筹五十万元合作经营。但随后不久,发起股东和承诺入股者,纷纷反悔退出,“商股”无法凑足。张謇不得不再退一步,一面压缩总股本为五十万元,一面改为“绅领商办”,即由他自己认领官股的二十五万元,再另外筹集二十五万元,官方只收取官利,不参与工厂的经营管理。尽管如此,张謇所需股金仍无法凑齐。他只得奔波沪通两地,多方集资求助,有时不得不靠卖字来弥补旅费的短缺。面对乡党友朋的讪笑毁阻和各方敷衍作梗,他虽“闻谤不敢辩,受辱不敢怒”,仍坚韧不拔地往前走。

在苦心创办了五年后,1898年,大生纱厂终于建成投产。为了记住纱厂创办过程中的磨难和教训,张謇特意请人画了四幅“厂徽图”(张謇亲笔题词点题),挂在工厂的公事厅。四幅画作分别讽刺抨击了集资办厂过程中洋行买办的反复无常、官僚奸商的言而无信、本地官吏的阴险阻挠、上海巨商的贪得无厌。

后来,大生纱厂虽然在开工半年后就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张謇的实业和教育等民生实业随之也不断拓展,但他还是不断遭遇波折和磨难。1922年以后,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及自身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原因,特别是由于产品的滞销、资金链断裂、垦牧公司的灾祸,大生企业集团濒临破产。但即使在这时,张謇还是怀揣他的强国梦,以无比顽强的意志奋斗拼搏,直到临去世之前,他还抱病视察沿江水利工程。

(三)为强国,至死不渝

爱国、救国、强国,像一根光彩夺目又厚重无比的主线,贯穿了张謇的一生。为强国,他探索了一生,奋斗了一生,坚守了一生。直到垂暮之年,张謇念念不忘的还是国家强盛、天下太平。在他逝世前不久,南通南郊剑山雷神祠修建落成,他为之题一副楹联:百里蒙休,山川大神止于此;万方多难,云雷君子意何如?在这里,他借咏雷神,表达了他“天佑中华,使多难的国家走向强盛”的殷切愿望。

毛泽东曾说过,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同理,一个人爱国并不难,难的是

一辈子爱国,一辈子将爱国之心化为强国之行。张謇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张謇以他一生痴迷强国梦的爱国主义壮举,践行了他的人生理念:“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

二、亦政亦商为中华

作为企业家的张謇,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是既搞经济活动,又搞政治活动,既经商,又从政,既是企业家,又是政治家。

(一)兼具官员和经商者的双重角色

纵观张謇的一生,从 22 岁任江宁法审局书记,即涉足官场、政坛。24 岁至 32 岁,任庆军首领吴长庆幕僚(30 岁时曾随吴赴朝鲜平乱,结识袁世凯)。35 岁为开封知府孙云锦幕僚,并受河南巡抚倪文蔚委托,主持黄河防灾抗洪工程计划,草拟疏塞大纲。随后,一面赶考,一面在江宁、崇明、赣榆等地书院任职。

42 岁高中状元后,任翰林院修撰(相当于朝廷中枢文秘,最高官级为三品);43 岁在家丁忧时,奉两江总督张之洞之命,总办通海团练,并主持江宁文正书院;46 岁(1898 年)入京销假,为翁同龢起草《京师大学堂办法》等文稿。在戊戌变法前请假回乡,任江苏商务局总理;52 岁任商部头等顾问官;53 岁任江苏教育会会长;54 岁任苏省铁路公司协理;56 岁奉旨筹备江苏咨议局,当选为议长;58 岁任农工商大臣,东南宣慰使;59 岁任江苏两淮盐政总理,同年 11 月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61 岁任袁世凯政府农商部总长,全国水利局总裁(1915 年辞职);67 岁任运河督办;68 岁任吴淞商埠局督办。由此可见,张謇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有官职(尽管有的是虚职,但他的官员身份始终存在)。

在具有官员身份的同时,张謇扮演了经商者和企业家的角色(大大早于他 1895 年正式下海创办纱厂)。1886 年,张謇 36 岁时,结束了幕僚生涯,回到家乡,一面备考,一面以商业眼光帮助父亲集

资购买湖州桑苗,鼓动乡民赊购,推广植桑养蚕。他与家长还向乡民售发柏秧、槐秧和油桐子,发展经济林木。随后,他采用商业经营方式,集资开办公司,推销桑秧,由乡民自定购买数量,只记账不付现金,三年后乡民卖桑叶供公司养蚕,从付给乡民的现金中扣取秧苗成本和两分利息。这种具有现代气息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今天看来仍有价值。这凸显了张謇经商创业的精明和高明。

1895 年,张謇正式办厂经商。从此以后,他尽管仍不断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甚至还担任各种虚虚实实的官职,但他始终没有丢弃企业,没有丢弃企业家身份。以至于在他生前身后,人们都首先把他看作是一位搞实业的企业家。

(二)同时开展政治和经济活动

犹如兼具官员与经商者双重身份一样,张謇在开展经济活动的同时,积极投身于各种政治活动,以至于无论是在早期地方政商环境的改善中,还是在后来全国的政治舞台上,甚至包括晚年的南通地方自治方面,他都展现了政治家的风采。

张謇早期在涉足蚕桑、林木等经商活动的同时,还积极组织和参与了各种政治社会活动:一是联合地方士绅,禀请两江总督免除十年丝绢,以兴蚕利。二是动员地方官招商开行,收购蚕茧,发展蚕丝市场。三是牵头联络通州大布庄老板和各地花布商人,力争官府减收通海花布厘捐。四是筹办地方武装防卫组织“滨海渔团”,维护沿海地区安全。五是倡导建立社仓,备灾备荒,防止灾年发生社会动荡,恢复海门慈善堂,负责办理掩埋无主野尸等慈善事宜。

1894 年张謇大魁天下后,便积极投身于全国性的政治活动中,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张謇以新科状元的身份,凭借他早年赴朝平乱积累下的对朝日国情的认知,积极支持翁同龢的主战主张,并单独上疏,痛斥李鸿章不仅“主和误国”,而且“以庸劣而败和局”。此举震惊朝野,使张謇名动一时。

甲午战争以后,张謇满怀悲愤,积极建言献

策,以“救亡图存”。他在为张之洞所拟的《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提出练陆军、治海军、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建讲商务、讲求工政、多派游历人员、预备巡幸之所等九条建议,在当时产生极大影响。

1898年(戊戌)春,张謇因丁忧期满,入京到翰林院销假,参与翁同龢、康有为、梁启超主导的维新运动。但他主张稳健改良,自称与康、梁“群而不党”。在维新派惨遭镇压、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前夕,他辞谢京师大学堂教习的奏派,再度向翰林院请假,匆匆离京归乡。

1900年(庚子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事件。张謇等东南绅商名流,为避免繁华的东南一带陷入战乱,在清廷已贸然对外宣战的情况下,力劝刘坤一等东南督抚与英国等列强签订“东南互保”协议。这件事,在当时保住了清朝的半壁江山,但从长远看,动摇了朝廷的权威和统治根基,助长了地方及民间力量的上扬,诱发了后来的政治改良及最终的共和革命。

在随后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张謇也积极参与。他在1901年2月写的《变法评议》,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强调变法必须抓住基本的三条:一是“必先更新而后旧可涤者”;二是“必先除旧而后新可行者”;三是“新旧相参为用者”。实际上就是主张先立后破、先破后立、新旧融合三种方法并用。他提出了分阶段进行政治、教育、产业、民生等各方面的变革设想。

在看到清政府并不真心搞“变法”,“新政”亦无实质性成效后,张謇毅然投身立宪运动,并成为运动的实际领袖。他在立宪运动中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进行立宪考察研究和宣传鼓动。1903年去日本时,考察了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回国后便呼吁仿照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政治改革,张謇印译了许多立宪资料给朝廷和官绅。二是成立上海立宪公会和江苏咨议局,直接组织推动立宪运动。三是发起组织了三次全国性的早开国会请愿活动,迫使清廷同意提前3年于1913年召开国会,并且预

行组织责任内阁。

立宪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精英群体与民众互动的大规模政治运动,直接动摇了清廷的政治基础和统治合法性,间接促成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和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建立。张謇晚年在为自己编写的年谱作序时写道:“一生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常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后,张謇逐步由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者,转为支持革命和共和,并在“南北议和”中充当重要角色(由“通官商之邮”变为“通南北之邮”)。他一手托三家:首先劝清廷顺应大势及时体面退位;其次劝革命党人适可而止,共创太平;然后再劝袁世凯以革命形势逼迫清廷退位,但不要扑杀革命力量,做华盛顿那样的开国元勋。

1912年1月10日,张謇致电袁世凯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于是,清王朝在紫禁城内安享尊荣,袁世凯当了正式大总统,革命党人宣告革命成功,老百姓免受战乱,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成立。张謇在自身完成由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蜕变的同时,也促成了中国封建制度向现代政治制度的转型变革。

1913年至1915年,张謇任袁世凯政府农商部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在此期间,他一方面抓全国经济勘察、规划,一方面大搞经济立法。民国初期70%的经济法律、法规都是在他任上制订的。他认为发展实业,亟须注重四个方面:一是乞灵于法律;二是求助于金融;三是注意于税则;四是致力于奖助。他认为,“法律犹如轨道,产业入轨道则平坦正直,毕生无倾跌之虞”,“不入轨道,随意奔逸,则倾跌立至”。

1915年,张謇因不满袁世凯的内政外交举措,辞官回到家乡南通,直到1926年去世。即使在这期间,他也没有放弃政治活动和政治追求。

1918年底,张謇为了在巴黎和会上使我国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而获得关税自主,致电政府及与会代表据理力争,并发起成立了“全国主张国际税法平等会”,自任会长。1919年初,巴黎和会召

开时,他针对日本政府的蛮横和北洋政府的妥协,频频通电,严正指出:政府即使愿去自杀,可人民难道就不希望生存?他呼吁政府代表拒绝在丧权辱国的合约上签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致电徐世昌、段祺瑞,指出:民众激愤,完全是因政府把原来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益拱手让给日本,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面对1920年直皖战争、1924年直奉战争、1924年江浙战争,张謇均奔走呼吁,斡旋调停,劝阻交战各方以人民福祉为重,停战讲和。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南通各界组成后援会发动募捐,张謇率先捐资,以示援助。孙中山去世时,他代表地方主持追悼大会,蔡锷灵柩路过南通,他组织全市人民举行公祭。一些全国性的政治活动,依然闪现着他忙碌的身影。

更难能可贵的是,张謇晚年在家乡的十多年,表面上看是在搞实业、办教育,实际上是在全力搞地方政治——“地方自治”,并以地方政治的成功(“模范县”)做示范,引领全中国(余秋雨称之为向全世界发出了现代化的“南通宣言”)。他搞地方自治的初衷是:“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

张謇兴办实业、热心政治,均是为了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兴旺、社会的进步,均出自于非同一般的爱国主义情怀。只要能救国强国,他什么都愿意做。他既是实业救国论者,更是政治救国论者;他既是优秀的企业家,更是杰出的政治家。他进则搞全国“大政治”,顾及南通;退则搞南通地方“小政治”,影响全国。不管怎样,他从未忘记救国救民和强国富民的政治理想,也从未停止过以政治现代化促经济现代化的探索和开拓。

(三)政商互动创大业

张謇秉持救国强国理念,在办实业、搞经济的同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源于他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深刻认识。张謇认为,“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政治能趋于轨道,则百事可为”。只有政治清明,才能使经济蓬勃发展。他在考察日本后,对比日本的富强与中国的贫弱,得出结论:“抉其病

根,则有权位而昏愦者当之”。因此,他主张要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进行政治改革,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条件。

基于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辩证理解,张謇主张除了在体制上进行政治变革以外,还要“借助实业来变更国体,强国富民,革故鼎新”。张謇一生着力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推动政治变革,一件是发展实业及民生事业,最终成果则集中体现在南通地方治理的成效上。张謇凭借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深刻理解,在实践活动中,也较好地处理了具体的政商关系。

一是充分利用各级政府的政策。如用足用活中央政府地方自治政策及江苏政府扶持实业政策等。二是妥善处理好与各级官员的关系,包括与江苏督抚及南通州官。三是以政兴商,以商促政。以“自治”为手段,改善政治小环境,助推经济发展;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促政治建设。

当今,时代不同了,我们不必要也不可能像张謇那样去搞政治和经济,但他认识和处理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思想与实践,依然对我们今天的企业家有启发。一是企业家也应该关心政治,促进以民主与法制为核心的政治建设。二是拥护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积极参与民主监督、民主管理,促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三是正确处理与地方政府及官员的关系:亲而不俗(亲近友好不庸俗);敬而不远(尊敬而不疏远);靠而不等(不消极等、靠、要,在政策扶持、要素配置、指导服务等方面主动争取)。

三、只手打造“第一城”

南通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打造“第一城”,全靠张謇非凡的见识和能力。遍观全中国、全世界,优秀的企业家比比皆是,但能够靠一己之力建设一座现代化城市,张謇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可从三个层面看“近代第一城”的含义:一是从城市的规划建设看;二是从城市的各种民生事业、公共设施看;三是从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建设看。其中,最重要而又最容易

被人忽视的是第三层面。

笔者曾在2003年召开的“中国近代第一城”学术研讨会上,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第一城”的丰富内涵。从城市建设的主体来看,南通是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全面规划并实施建设的具有近代意蕴的城市;从城市的形态布局和功能来看,南通是一座世界近代史上开风气之先的城市;从城市的发展基础看,南通是一座各项事业全面推进的城市;从城市建设的价值取向来看,南通是一座充满人文关怀的城市;从城市建设与区域发展的关系来看,南通初具区域整体发展的雏形。现在看来,这些论述尚有道理,但对第三个层次揭示不够。

张謇在南通所有作为的初衷是“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形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虽牛马于社会而不辞也”。他要统筹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为中国打造一个能与世界先进国家城市相媲美的现代化城市样板,以示范、引领中国走向繁荣昌盛。

在政治建设方面,张謇充分利用中央政府关于地方自治的政策,于1908年破天荒地发动民众选举,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省以下“议会”——通州议事会,并亲任议长。议事会及随后的地方自治会成立后,设立了测绘局、调查户口事务所、法政讲习所、清查公款公产事务所等一系列“准政府”机构,干了许多“州官”应该干的事儿。他还建立了商会、农会、慈善会、长江保坍会等各种社会团体,发动各方共同参与地方治理。更令人称奇的是,他还建立了维护治安的警卫队,花钱改造政府的监狱、驻军营房,建妓女改造所和戒毒所等。

张謇的现代化政治建设之所以能走在全国前列,主要是因为做到了“五个充分运用”:一是充分运用地方自治政策;二是充分运用特殊的政治身份;三是充分运用省级官僚的授权和支持;四是充分运用当地老百姓的拥戴;五是充分运用自己的从政经验和聪明才智。

经济建设方面,张謇从创办大生纱厂开始,由工业到农业(盐垦、种植),到生活服务业(商业、旅馆、房地产开发),到物流运输(大达轮船公司、汽

车公司、十六铺码头),到金融保险(淮海实业银行、保险公司)等,甚至还与比利时合资兴办中比航业公司及专事对外贸易的新通贸易公司。他创立的南通绣品公司还在美国纽约第五大道设立分公司,经营刺绣工艺品。他在逐步建立起全国最大的产业资本集团的同时,全面地促进了南通经济现代化建设。当时的南通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在中小城市中首屈一指。

当年中国海关“一把手”英国人罗伯特·赫德每十年就出一份分析中国经济状况的《海关十年报告》,连续3次(30年)仅举上海和南通两个城市为案例。他说:“通州是一个不靠外国人帮助,全靠中国人自力建设的城市,这是耐人寻味的典型。”“所有愿对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将来作公正、准确估计的外国人,理应到那里去参观游览一下。”

在社会建设方面,张謇在加强社会管理、改善社会风气的同时,大力创办现代化的社会公共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1913年办大聪电话公司,建成南通市内电话网络。1916年开始建唐家闸公园和市区东、西、南、北、中五座公园,是我国最早对公众开放的公共园林。1917年办通明电气公司,形成从唐家闸到中心城区的供电布局。1917年成立南通公共汽车公司,公共汽车在港闸、城区等多条公路上运行。

张謇在南通创办的社会保障项目主要有:1906年创办的新育婴堂,1912年创办的南通医院,1913年在他60岁生日之际,用所得寿礼之金创办的养老院,1914年创办的贫民工场及济良所,1916年创办的残废院及栖留所。

在文化建设方面,张謇致力于文化事业现代化。1905年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912年建成图书馆,将自己收藏的八万多卷和征集采购的共13万卷图书置于馆内,供市民阅览。1913年后创办了《通海新报》等四种报刊,并创办了翰墨林书局。1917年在军山建气象台。1919年创办全国第一所戏曲学校——伶工学社,并建现代化大剧场——更俗剧场。同年还创办中国电影(影戏)制造股份公司,拍摄多部影片。

1922年,应张謇之邀,中国科学社第七届年会在南通召开。杨杏佛、马相伯、梁启超、丁文江、竺可桢、陶行知等知名专家学者纷纷汇聚南通。张謇在会上说道:“吾人提倡科学,当注重实效,以科学方法应用实业经济之研究与社会心理之分析。迨成效既著,人自求之不遑。执此道以提倡科学,未有不发达者。此为吾数十年经验之结论,愿诸君由此以兴科学”。科学社以新建的生物研究所作为张謇70寿辰贺礼,以答谢他对科学的倡导和支持。

“文化必先教育”。张謇在教育事业上的努力和成就更为人所津津乐道。他创办了三百七十多所各类学校,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从普通学校到专科学校、特种学校(聋哑人学校、职业技术学校、师范学校),几乎无所不包。他还规划在农村每八平方公里办一所小学,并成立了教育会、劝学所等几十个现代教育研究团体和机构。他还担任江苏教育会会长。可以说,张謇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教育现代化先驱和集大成者。世界闻名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在考察南通后,由衷地赞叹道:“南通者,中国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南通近百多年来,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绝非

偶然。

在生态建设方面,张謇在城市总体规划设计上,就考虑到生产、生活、生态的合理布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他比世界著名的城市规划大师霍华德还早三年提出并践行了“花园城市”的理念。除了主城区以外,他将唐闸设定为工业和港口区,狼山设定为风景旅游区,形成了科学合理的“一城三镇、城乡相间”的现代城市格局,既方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又改善了自然环境。他还封山育林,保护自然生态,在街道、公路两旁栽种行道树美化自然景观。他还成立“长江保坍公会”等社团,发动社会各方保护长江生态和水系。

总之,张謇以现代化的理念和标准,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全方位推进南通现代化建设,精心打造出了“中国近代第一城”。“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张謇当年全面推行现代化建设的理念和实践,虽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但作为宝贵的探索经验,对我们当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实施“五个统筹”和“四个全面”的战略方针,仍不乏有益的启示。

责任编辑 蒋建忠